

前景理论视角下兼业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

庄晋财, 卢文秀, 李 丹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行为出现诸多非理性现象。将兼业农户分为以务农为主的兼业农户 I 和以务农为辅的兼业农户 II 两类,从前景理论的视角对兼业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的兼业农户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并依据风险偏好做出农地流转决策;两类兼业农户都不倾向于转出农地,兼业农户 I 不转出农地的主要原因是追求土地收益的确定性,兼业农户 II 不转出农地的主要原因是不在乎农地转出的租金收益。

关键词 兼业农户; 前景理论; 决策行为; 农地流转; 风险偏好

中图分类号: F 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8)02-0136-09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xkb.2018.02.017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向结构性矛盾,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农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其中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问题。在农村,农地流转现象早已存在,并且规模逐步扩大,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4.6 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35% 左右^①。我国学者对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如农地保障功能替代程度、户主个体特征、家庭非农劳动力比重、非农收入比重、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劳均耕地面积、单位面积租金、租金收回风险等对农户的农地转出有正向作用;农地亩均收益、家庭耕地总面积、粮食价格及劳动力配置自由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有制约作用^[1-6]。另一方面是对农户在农地流转决策中行为准则的研究。这一研究在两种不同的假设下进行,一种是完全理性假设下的研究,如吕杰等使用农户总预期函数构建流转双方决策行为博弈模型,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进行博弈分析^[7];王正环基于生产要素理论、行为理论对农户流转决策进行分析,指出农地流转的驱动力是农户的理性行为决策^[8];陈飞等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认为只有当非农生产的预期收益与土地租金之和超过自己耕种土地所获得的收益时,兼业农户才会选择出租土地^[9]。另一种是非理性假设下的研究,比如有学者认为,农民农地转出行为并非基于经济上的效率最大化原则,而是体现农民生存伦理的“道义经济”原则^[10]。

目前的研究大多将农地转出方不加细化地分为“愿意转出”“不愿转出”两种,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掩盖了不确定条件下农户转出农地的心理和道德因素。Kahneman 等认为,人们在对不确定性事件进行判断和评估时,通常会设定一个初值即参照点,决策者总是会以自己的参照点来确定收益或损失,决定可能结果的取舍^[11]。因此,农民的参照点将对其决策行为的走向起关键作用,这是其判断转出土地与否的重要因素。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流转路径,都是

收稿日期:2017-05-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机理与实证”(71473106);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产业链区域分工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培育策略研究”(KYCX17_1747)。

作者简介:庄晋财(1967-),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

①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次会议就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答复”(http://gb.cri.cn/1321/2017/03/06/661s5235846.htm)。

在特定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决策。基于此,引入前景理论分析兼业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为理解和把握不确定条件下农户农地转出的不同决策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一、前景理论视角下兼业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倾向

1. 前景理论及其对行为决策倾向的解释

前景理论是描述性范式的决策模型,由 Kahneman 等提出,在 Simon 的有限理性基础上通过修正最大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发展而来^[11]。它用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共同度量总体价值,认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风险的态度由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联合决定。所谓价值函数,是指决策者主观感受价值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函数表达。根据前景理论,人在收益情形下是风险厌恶的,而在损失情形下是追求风险的,也就是说,相同数值的损失带来的痛苦要远远大于收益带来的快乐。所谓权重函数,则是指人们一般会高估小概率事件而低估中大概率事件,当中大概率事件发生时,收益情形下的风险厌恶要比损失情形下的风险追求更明显。

前景理论描述的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价两个阶段,在编辑阶段,决策个体对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和处理,在评价阶段则会选定某个参照点,依赖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对信息予以判断,但是不同的信息整合与简化方法会形成不同的事件和组合,并导致人的非理性行为和框架依赖效应,即人对同一问题的最后决策的不一致^[12]。前景理论把人的决策行为倾向描述为五个基本原理:一是参照依赖原理,即大多数人往往根据某种参照点来判断自己的得失从而做出决策;二是损失效应原理,即大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从而在决策过程中会更关注损失;三是确定效应原理,即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利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因此决策行为会更倾向于维护确定的收益;四是迷恋小概率事件原理,即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会过分关注极端的但发生概率很低的事件而忽略发生概率较高的事件;五是反射效应原理,即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好的,从而在决策过程中面对确定的损失会倾向于“赌一把”^[13]。此外,根据前景理论价值函数特征还可引申出一条基本规律,即敏感度递减规律,它揭示的是价值函数曲线向两端延伸时,方向的变化呈现敏感性递减趋势。依据这五个基本原理和一条基本规律可以将人的决策过程特征概括为:人在面临获利时是不愿冒险的,但在面临损失时却成了风险追求者;人对损失带来的痛苦比对获利带来的喜悦更敏感,而损失和获利都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因此改变评价事物的参照点,就会改变人对风险的态度。

2. 兼业农户的主要类型

农户兼业现象十分普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变迁,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游离出来;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户对生存的需求已转变为对发展的需求,需求的升级促使农民在现有条件下寻求更好的发展途径,从而选择走出乡村,寻找多元化的就业机会。

随着我国农户发展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产业间流动性显著增强。农民就业呈现多元化趋势,农民的身份也从“单纯小农”转变为“复杂小农”^[14]。此背景下,农户由于技术水平、市场参与能力、家庭耕地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实现不同程度的兼业,使农地流转问题成为一个不确定性问题。依据前景理论,在农地流转决策中,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行为目标和准则,在不同环境因素下做出各自的判断和评估,最终做出决策。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过程,本文依据农户主要经济来源的不同,将我国农村兼业农户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50% 以下^[15],劳动力较少,常年居住农村,外出务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且就业难度大的农户,定义为兼业农户 I,其特征是以农为主,农闲时外出兼业;另一类是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50% 以上^[15],非农劳动力较多且就业较稳定的农户,定义为兼业农户 II,其特征是以外出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由于这两类兼业农户的经济来源结构不同,对待土地的态度也不同,因此对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倾向也不相同。

3. 前景理论对兼业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决策倾向的分析

(1) 参照依赖效应下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大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参照点决定,因此,

农户的参照点将对其决策行为起关键作用,是影响其转出农地与否的重要因素。农户一般会以现有的财富水平作为农地转出与否的参照点,在决策时与此相对照,以财富值变化量决定对农地转出是“追求”还是“规避”^[16]。根据前景理论价值函数,农户选择转出农地前后财富值的变化作为其土地流转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一般来说,生活成本、非农收入及农地租金或收益是引起财富值变化的经济变量,同时,乡土情结、社会保障等情感、制度因素也会影响农户对财富值变化的衡量。对于那些青壮年外出务工而家庭劳动力较少的农户来说,主要是常年居住农村的中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农闲时也有外出务工以补贴家用的意愿,但在劳动力市场往往受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且易受到青壮年劳动力排挤,外出就业难度较大,农村土地却很好地容纳了这些劳动力。该类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务农收入(兼业农户 I),务工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如果完全转出农地,除农地带来的少量租金收益外,农户将失去较固定的农业收入,同时还将面临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财富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还可能面临降低的风险。由此可见,对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 I 来说,在参照依赖效应作用下,通常不会选择转出农地。

(2) 损失效应下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根据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决策者主观感受的价值存在财富值增减变动的参照点,该点的位置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价值函数衡量人对盈利或亏损的主观满足程度,函数曲线在参照点处开始转折,是财富值盈亏变化的分界线。以务农为主要收入的兼业农户 I,若转出农地进城务工,其财富值将面临降低的风险,即转出农地会给农户带来损失。由于农户对损失更加敏感,倾向于损失规避,因此,兼业农户 I 不会选择转出农地,而选择在劳动力能力范围内扩大耕地面积或继续实现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3) 确定效应下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确定的收益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会选择确定的收益。对于家庭耕地总面积较多的农户来说,他们主要依靠从事农业生产来满足生活需要,农闲时兼业以满足发展需要,如从事泥瓦匠、保洁、小商小贩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这类工作临时性、灵活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导致此类农户非农就业收入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兼业农户 I 的农业收入是其固定的经济来源即确定的收益,而转出农地外出务工是一个风险事件,面对非农就业收入的不确定性时,兼业农户 I 是风险厌恶的,倾向于风险规避。因此,在现有土地规模没有完全吸纳其家庭劳动力,且农业依然是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兼业农户 I 更愿意通过承接其他农户的土地来提高其家庭收入。

(4) 迷恋小概率影响下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决策权重函数中, $w(P)$ 描述未来前景中单个事件的概率 P 的变化对总体效用的影响,函数曲线(横轴 P 为真实概率,纵轴 $w(P)$ 为主观概率)是一条斜率大于 0,小于 1 的曲线。当某事件出现的概率 P 很小时, $w(P) > P$,这表明人们对于概率很小的事件会过度重视;但当出现的概率较大时, $w(P) < P$,这说明决策者往往会高估小概率事件而低估中高概率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迷恋小概率”。在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决策时,通常也会受其主观概率引导,对风险性事件赋予较大权重而对确定性事件赋予较小权重。在当前国家政策对“三农”问题相对重视的情况下,相当多农户对国家的重农政策抱有好的预期,认为转出农地会使农户面临农业收入和国家相关补贴的损失,再加上非农收入的不稳定性,转出农地就成为一个风险性事件,农民主观概率趋近于 0;与此相反,经营农地带来的农业收入对于满足家庭生活生产的需要,以及临时性外出务工收入对于满足农民的发展需要,却是一个确定性事件,农民主观概率趋近于 1。当主观概率趋近于 0 或 1 时,农民对概率的变化比较敏感,概率因素是决定其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不管是兼业农户 I 还是兼业农户 II,在农地流转决策过程中会倾向于规避转出土地的高风险而选择保留农地。

(5) 反射效应下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前景理论认为,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好的,在确定的损失和“赌一把”之间做选择,多数人会选择“赌一把”。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较多的家庭大多已实行内部分工,即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妇女及中老年劳动力在家务农,这类家庭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大。对于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说,一方面,常年在外出务工拥有较稳定的社会关系,就业相对稳定且收入较高;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与城市社会的耦合度较低,加上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完善,使其进城生活得不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保障,进城务工又

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但是,由于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尽管与外出务工相比,从事农业的收入是相对确定的,但放弃外出务工将可能失去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因此,这部分农户在面临“外出务工还是在家务农”的决策时,会认为“不外出务工就是损失”,倾向于追求风险,这类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就是兼业农户 II。但由于受到前景理论中迷恋小概率的影响,对他们来说,为了避免转出土地错失国家补贴、外出务工不确定性以及非农收入不稳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他们会选择外出务工,将农地撂荒或转给亲友代耕。因为这样可以使其掌握农地的控制权,返乡即可收回农地,从而避免了上述风险,尽管这种风险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6)敏感度递减规律作用下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价值函数曲线是“S”型的,对收益而言是上凸的,对损失而言是下凹的,向两端延伸时,方向的变化呈现敏感度递减趋势,该趋势也影响着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对于兼业农户 II 来说,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是非农就业收入,相对于从事农业的较低收益,非农就业收入已经在家庭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农户对转出农地带来的租金等收益增量敏感度是递减的。这就导致农户生活水平虽然已经通过非农就业有很大改善,但仍不愿转出农地,而是倾向于选择无偿或低偿交给亲戚朋友代耕,甚至有撂荒的可能。

综上所述,将农民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置于前景理论的相关效应及规律中进行分析发现,由于参照依赖效应、确定效应及迷恋小概率效应的影响,对家庭劳动力较少、非农就业难度大且农业收入占主导地位的兼业农户 I 来说,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具有不愿转出农地的行为决策倾向;而对于兼业农户 II 来说,由于务农的比较收益较低,不外出务工是确定的损失,受前景理论中反射效应的作用,他们表现为风险追求,更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与此同时,在敏感度递减规律及迷恋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下,他们对农地流转的行为决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以出租等有偿的方式转出农地;二是以无偿的方式转给亲戚朋友代耕或者撂荒。

二、前景理论视角下兼业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过程

1. 模型构建

前景理论模型描述的整个决策过程包括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在编辑阶段,决策者对不同的可能性结果进行初步分析,得出简化的结果。就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而言,编辑阶段的行为主要包括三个:一是农民选择现有财富水平为参照点;二是通过主观感知转出前后财富值的变化确定决策行为带来的后果(收益或损失),其中财富值的变化量受生活成本、非农收入、农地租金或收益及乡土情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便利、子女教育)等因素影响;三是确定决策行为的价值及转出农地引起财富值变化的主观概率。在评价阶段,作为决策者的农户结合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计算转出农地这一行为的前景值,选择最高前景值作为行为决策结果。兼业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整个决策过程如图 1 所示。

(1)农地转出决策参照点的确定。在前景理论中,参照点的选取最为关键,农户在进行决策时将对比参照点来衡量收益和损失。本文以农户当前所拥有的财富水平作为农户是否转出农地的参照点,兼业农户的财富主要由兼业务工收入、务农收入及生活成本构成。则农户当前所拥有的财富水平可用公式(1)表示:

$$\omega_{now} = \omega_a + \omega_b - c_1 \quad (1)$$

式(1)中: ω_a 为农民兼业务工收入, ω_b 为兼业务农收入及 c_1 为农村生活成本。

设农户主观估计若转出农地,则财富水平为 ω_{later} 。农户的财富水平为:

$$\omega_{later} = \omega_1 + \omega_2 - c_2 \quad (2)$$

式(2)中: ω_1 是农户转出农地后务工收入, ω_2 是转出农地租金收益及 c_2 为进城生活成本。

农户以当前所拥有的财富值 ω_{now} 为参照点,然后农户对转出后的财富值进行编辑、评价,将转出农地后财富值 ω_{later} 与当前财富值 ω_{now} 进行比较,以权衡得失。当 $\omega_{later} \geq \omega_{now}$ 时,农户认为转出农地将获得收益;当 $\omega_{later} < \omega_{now}$ 时,农户认为转出农地将产生损失。若 x 表示农户在转出农地决策时,主观估计选择转出农地后的收益或损失,可定义 x 为:

$$x = \omega_{later} - \omega_{now} \quad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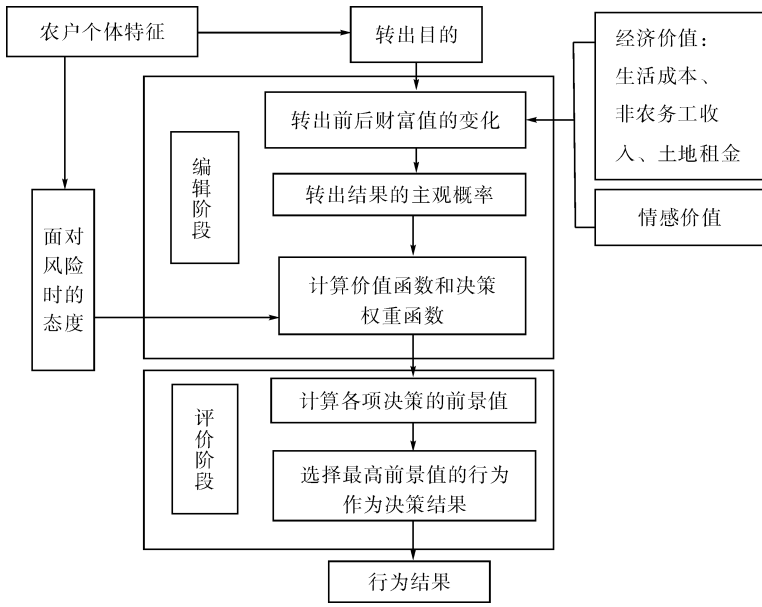


图 1 兼业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过程

(2)农地转出决策价值函数 $v(x)$ 的确定。价值函数 $v(x)$ 描述了农户对转出农地的价值估计和 risk 态度,农户的参照点决定价值函数的大小,若不同的农户选取不同的参照点,则最终得到的价值(收益或损失)也是不同的。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决策时,对转出农地与否进行评价,计算转出前后的财富值。由公式(3)计算得出 x , x 越大,价值函数值就越大。根据 Kahneman 等提出的价值函数表达式^[17],农户在决策阶段的价值函数 $v(x)$ 可定义如下:

$$v(x) = \begin{cases} x^\delta & x \geq 0 \\ -\lambda (-x)^\gamma & x < 0 \end{cases} \quad (4)$$

式(4)中: δ 为风险态度系数, $0 < \delta < 1$, δ 越大表示农户越愿意冒险,当 $\delta = 1$ 时为风险中立者; λ 为农户对损失的规避系数。若 $\lambda > 1$,则农户将对损失更加敏感。农户个体不同,表现出的 δ 和 λ 值不同。根据 Kahneman 等的标定,当 $\delta = 0.88$, $\lambda = 2.25$ 时与经验数据一致。

(3)农地转出决策权重函数 $w(P)$ 的确定。根据前景理论的决策权重函数的形式^[17],概率权重计算如下:

$$\text{收益: } w^+(p) = \frac{p^\gamma}{[p^\gamma + (1-p)^\gamma]^{\frac{1}{\gamma}}} \quad (5)$$

$$\text{损失: } w^-(p) = \frac{p^\delta}{[p^\delta + (1-p)^\delta]^{\frac{1}{\delta}}} \quad (6)$$

根据 Kahneman 等的标定,当 $\gamma = 0.61, \delta = 0.69$ 时与经验数据一致。

(4)计算前景值。用 S 代表农户对转出前后财富水平的估计,称为状态集, S 的一个子集称为事件,代表了转出与不转出两种决策行为;用 X 表示事件结果集,代表农户估计转出农地可能的结果,即可能的损失或收益, $x_k \in X$ 。在应用前景理论时,需要将各种可能的结果按增序排列得到该结果的下标,即应有 $x_i > x_j$ if $i > j$ 。当下标为 0 时代表无收益也无损失,当下标为正时,代表收益;下标为负时,代表损失。一个不确定的前景 f 可以看作从 S 到 X 的一个函数,对于 $\forall s \in S$,都有一个 x 使得 $f(s) = x$ 且 $x \in X$ 。设转出农地的效用是有限离散分布的,令其效用为 $x_i = (x_{-m}, x_{-m+1}, \dots, x_{n-1}, x_n)$,选择概率为 $p_i = (p_{-m}, p_{-m+1}, \dots, p_{n-1}, p_n)$, π_i 为主观概率函数的综合值, $\pi_i = (\pi_{-m}, \pi_{-m+1}, \dots, \pi_{n-1}, \pi_n)$ 。根据前景理论,转出农地与否的前景值可得:

$$V(f) = \sum_{i=0}^n \pi_i^+ v(x_i) + \sum_{i=-m}^0 \pi_i^- v(x_i) \quad (7)$$

式(7)中,

$$\begin{aligned} \pi_i^+ &= \omega^+(p_i \cup \dots \cup p_n) - \omega^+(p_{i+1} \cup \dots \cup p_n), 0 \leq i \leq n-1; \\ \pi_i^- &= \omega^-(p_{-m} \cup \dots \cup p_i) - \omega^-(p_{-m} \cup \dots \cup p_{i-1}), 1-m \leq i \leq 0 \\ \text{令 } \pi_i &= \pi_i^+, i \geq 0; \pi_i = \pi_i^-, i < 0, \text{ 则公式(7)转化为:} \end{aligned}$$

$$V(f) = \sum_{i=-m}^n \pi_i v(x_i) \tag{8}$$

(5)根据风险偏好做出决策。农户是否转出农地是由财富值盈亏变化所决定的,依据前景理论,前景值的大小(正负)反映了农户转出农地的决策收益或损失的大小,农户通过比较所有备选方案前景值的大小,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做出决策,即农户在做农地流转决策时,面临两种备选方案,一是转出农地,假设该方案为 a 方案;二是不转出农地,假设此方案为 b 方案。当且仅当 $\sum_i \pi(p_i)v(\Delta x_i) > \sum_i \pi(q_i)v(\Delta x_i)$ 时,农户选择 a 方案。其中, $\Delta x_i = x_i - x_0$, x_i 是农户做出决策后的财富值,参考水平 x_0 是农户初始财富值, a 方案导致不同财富值 x_i 最终实现的概率是 p_i , 而方案 b 导致 x_i 最终实现的概率是 q_i 。

2. 案例分析

根据前述分析,不同类型的农户对转出农地决策的风险态度和风险认知是不同的,进而导致两类农户在农地转出决策中有两点区别:一是对转出农地后财富值变化量的主观估计值不同;二是对转出农地决策可能引起的“损失”或“收益”的主观概率赋值不同。通过实例,将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置于前景理论模型中,分别对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 I 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 II 的农地转出决策行为进行分析。

(1)确定参照点。由于农户知识水平及获取信息的有限性,农户面临农地流转决策时通常以现有财富值为参照点,当农户主观估计转出农地后的财富值高于现有财富值时,表示转出农地可以带来收益;当农户主观估计转出农地后的财富值低于现有财富值时,表示转出农地将带来损失。为了获取有效数据,笔者于 2015 年 1—2 月在粮食主产区河南省太康县和湖北监利县 7 个村寨进行调研。采取随机抽样与典型抽样方式相结合的方法,以及与农户和部门访谈等方式,共发放问卷 561 份,收回有效问卷 512 份,有效率 91.27%。根据调查所得的数据,得到两类农户财富水平构成要素如表 1 所示。

表 1 兼业农户的财富值构成要素 元/月

农户类型	兼业务工收入 ω_a	兼业务农收入 ω_b	纯务工收入 ω_1	农地租金 ω_2	农村生活成本 c_1	城市生活成本 c_2
兼业农户 I	1 305	1 500	3 184(0.35)2 600(0.65)	400	830	1 400
兼业农户 II	2 609	1 000	4 600(0.42)3 850(0.58)	250	830	1 600

将以上数据代入公式(1)(2)得兼业农户 I : $\omega_{now} = 1\ 975$; $\omega_{later} = 2\ 184/1\ 600$; 兼业农户 II : $\omega_{now} = 2\ 779$; $\omega_{later} = 3\ 250/2\ 500$ 。

(2)确定概率权重。由于兼业农户 I 具有家庭劳动力较少,常年居住农村,季节性外出务工(农闲时外出)且就业难度大的特点,从而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较少。该类农户转出农地后财富值的变化量,是由其从事纯务工的收入与当前兼业收入的差值决定的。农户当前兼业收入为兼业务工收入(1 305 元)与兼业务农收入(1 500 元)之和,即 2 805 元。根据 2015 年基于粮食主产区的 7 村寨调研数据,农户主观估计转出农地后纯务工收入的两种情况:最高收入 3 184 元,最低收入 2 600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2 000 元以下的占 9.5%, 2 000~2 900 元占 55.5%, 2 900 元以上占 35.0%^[18]。由此推测农户对转出农地带来收益或损失的主观概率分别为 0.35 和 0.65,即农户主观估计转出农地后财富水平较目前财富水平提高的概率为 0.35,下降的概率为 0.65。

兼业农户 II 的特征是,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50%以上,非农劳动力较多且就业较稳定,主要从事技术行业或自营就业,务工收入较高,由于他们在城市居住的时间较长,生活成本高于兼业农户 I。

因此,该类农户转出农地后财富水平受其就业稳定性影响。如果我们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是否接受技能培训两个指标衡量就业的稳定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我国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和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重均约为38.0%,且以每年1.9个百分点提升^[18]。据此推测该类农户对转出农地将带来的收益或损失的概率分别为0.42和0.58,即农民主观估计转出农地后财富水平较目前财富水平提高的概率为0.42,下降的概率为0.58。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两类兼业农户在农地流转决策中均有两种备选方案:对于兼业农户Ⅰ来说,做出农地转出决策,财富水平提高的概率为0.35,财富值下降的概率为0.65,做出农地不转出的决策,则财富值不变化;对于兼业农户Ⅱ来说,做出农地转出决策,财富水平提高的概率为0.42,财富值下降的概率为0.58,做出农地不转出决策,则财富值不变化。

(3)计算价值函数 $v(x)$ 与概率权重函数 $w(p)$ 。分别将两类兼业农户现有财富值 w_{now} 和转出农地后主观估计财富值 w_{later} 代入公式(3)得收益 x_1 和损失 x_{-1} ;将 x_1 和 x_{-1} 代入公式(4)计算得主观价值 $v(x_i)$;将两类兼业农户决策方案中主观概率 p_i 代入公式(5)、(6)得 $w(p_i)$,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两类兼业农户主观价值与决策权重

农户类型	收益 x_1 /损失 x_{-1}	主观价值 $v(x_i)$	主观概率 p_i	决策权重 $w(p_i)$
兼业农户Ⅰ	209	110.1	0.35	0.34
	-375	-414.3	0.65	0.55
兼业农户Ⅱ	571	266.6	0.42	0.40
	-179	-216.1	0.58	0.51

(4)计算前景值 $V(f)$ 。将计算得出的 $v(x_i)$ 与 $w(p_i)$ 代入公式(8)得出结果,两类兼业农户在农地流转决策中的两种不同方案如表3所示。

表3 两类兼业农户的前景值计算结果对比

农户类型	备选方案	方案属性	前景值	最优方案
兼业农户Ⅰ	方案一	(209,0.35;-375,0.65)	-190.43	—
	方案二	(0,1)	0	✓
兼业农户Ⅱ	方案一	(571,0.42;-179,0.68)	-3.57	—
	方案二	(0,1)	0	✓

(5)依据风险偏好做出决策。根据表3的前景值计算结果,对于兼业农户Ⅰ,方案一的前景值为负,小于方案二,说明兼业农户Ⅰ转出农地财富水平会降低。依据前景理论的参照依赖、损失效应、确定性效应及迷恋小概率事件效应,兼业农户Ⅰ面对非农就业收入的不确定性时,表现为风险厌恶,倾向于风险规避。因此在土地规模没有充分吸纳其家庭劳动力,且农业收入是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这部分农户更愿意通过承接土地来提高其家庭收入;对于兼业农户Ⅱ,方案一前景值为负,小于方案二,同样说明兼业农户Ⅱ主观估计转出农地财富值会降低,根据前景理论的反射效应和敏感度递减规律,该类农户面临“进城务工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是风险追求的,但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与城市社会的耦合度较低,加之社会保障不完善,因此这部分农民倾向于选择在城市挣钱,在农村消费的生活方式,同时将农地撂荒或转给亲友代耕,掌握对农地的控制权以便返乡可随时收回农地。

综上分析,前景理论视角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全过程如下:农民选取现有财富值为参照点,通过主观感知转出农地前后财富值盈亏变化,确定引起财富值变化的主观概率,计算前景值,最后依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做出决策。前景理论对农户转出行为决策中的非理性现象可做出合理的解释:

第一,对于为什么农户宁愿选择兼业而不愿转出农地的解释是,从兼业农户Ⅰ的情形来看,当其认为转出农地带来损失的概率很高时,就会选择不转出农地,采取以农为主、农闲时务工的兼业形式,以得到相对稳定的收入,这就是确定效应;从兼业农户Ⅱ的情形看,由于农民认为“不外出务工就是损失”,因此会选择承担风险而外出务工,但是农民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因此这部分农民倾向于选择在城市挣钱,在农村消费的生活方式,从而不会做出转出农地的决策,即反射效应。

第二,对于为什么农户倾向于选择代耕这一农地转出路径的解释是,根据前述分析,兼业农户Ⅰ

是不会做出农地转出决策的,而兼业农户Ⅱ对转出农地的经济要求不高,通过把农地转给亲戚朋友耕作,便于随时收回土地。然而,由于非农就业不稳定,农户倾向于选择可以随时收回农地的代耕形式(如表 4)。

表 4 两类兼业农户的决策依据与结果

不合理现象	农户类型	理论依据	决策结果
农户宁愿选择兼业而不愿转出农地	兼业农户Ⅰ	参照依赖与损失效应、确定效应	农户不会选择转出农地,而选择在劳动力范围内扩大耕地面积或继续实现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兼业农户Ⅱ	反射效应	农民倾向于在城市挣钱,在农村消费。
农户倾向于选择代耕	兼业农户Ⅱ	敏感性递减规律	选择无偿或低偿交给亲戚朋友代耕

三、结论与建议

以前景理论为依据,将农户分为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Ⅰ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Ⅱ,并对其农地转出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农地流转决策中,兼业农户Ⅰ和兼业农户Ⅱ都会选择不转出农地。对于兼业农户Ⅰ来说,不转出农地有三个原因:一是转出农地使其财富水平面临降低的风险,农户倾向于保留农地;二是继续从事农业对农户来说是确定的收益,而非农就业具有不确定性,农户倾向于选择确定的收益,即保留农地;三是转出农地是一个风险事件,农户倾向于选择保留农地。对于兼业农户Ⅱ来说,不转出农地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放弃非农就业选择纯农业是确定的损失,农户倾向于转出农地或找人代耕;二是转出农地带来的收入增量不足以影响农户决策,农户倾向于保留农地或找人代耕,甚至撂荒土地。

农民的农地转出决策行为一方面受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农民面临不确定的就业环境,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及以何种路径实现流转,也受特定行为下的主观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农地流转不仅是一项农业领域的政策调整,更是一项涉及农村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领域政策变迁的综合性顶层设计,须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推进^[19]。针对以上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行为中的非理性现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实现共享土地经营权。共享土地经营权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专业合作社;二是“全托管”服务型规模经营;三是“半托管”代耕代种服务型规模经营^[20]。一方面,由于城市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呈现不稳定增长的态势,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波动,进而导致不愿转出农地的兼业农户Ⅰ的情形。而这类农户加入专业合作社可以使他们不退出农地的情况下提升规模化经营水平。另一方面,对兼业农户Ⅱ来说,非农就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他们又不能举家进城生活,则可以选择“半托管”代耕代种服务型规模经营。

(2)鼓励农民工乡村创业。农户不愿转出农地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整体就业压力增大。没有实现市民化的农民无法承受“三权分离”式的市场化流转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导致他们对代耕之外的转出方式缺乏信心与认同^[21]。对兼业农户Ⅰ来说,长期务农具有丰富的田间管理经验,因此可扩大农地经营规模,逐渐成为农机大户或家庭农场主,进而通过提供服务,牵头组建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带动其他兼业农户创业,由此推进农民创业由生存型向机会型转变^[22]。

(3)增加农民就业稳定性。一是加强直接面向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为农民选择不同的就业途径提供技术支持,使农民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二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新农保及新农合等的保障功能,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融入感,提高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稳定性。

参 考 文 献

[1] 聂建亮,钟淑宝.保障功能替代与农民对农地转出的响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1):103-108.

- [2] 何萍,张文秀.城乡统筹试验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研究——基于成都市 296 户农户调查[J].资源与产业,2010,12(5):111-116.
- [3] 吴云青,罗倩,蔡为民,等.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天津市 578 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6):69-74.
- [4] 孙宝敬,南灵.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白水县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0(6):336-337.
- [5] 赵晓秋,李后建.西部地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8):70-78.
- [6] 平珊,艾建国.农地转入意愿与转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部县盘龙镇农村的调查[J].安徽农业科学,2015,43(18):276-279.
- [7] 吕杰,冉陆荣.林地流转中不同类型农户决策行为博弈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1,25(4):32-34.
- [8] 王正环.影响农地流转的农户理性行为决策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2,15(4):21-25.
- [9] 陈飞,翟伟娟.农户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诱因及其福利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5(10):163-176.
- [10] 张建雷,王会.土地的道义经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再认识——基于安徽省 L 村的实证调查[J].学术论坛,2014(5):108-112.
- [11] 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 *Econometrica*, 1979, 47(2): 195-236.
- [12] 卡尼曼, 斯洛维奇, 特沃斯基. 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 启发式和偏差[M]. 方文, 吴新利, 张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13] 孙惟微. 赌客信条[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
- [14] 符莉. 道义小农还是相对道义小农[J].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09(2): 71-74.
- [15] 张忠明, 钱文荣. 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的调查与实证[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3): 19-24.
- [16] 陈超, 任大廷. 基于前景理论视角的农民土地流转行为决策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1, 32(2): 18-21.
- [17] KAHNEMAN D, TVERSKY A.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2, 5(4): 297-323.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3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4-05-12)[2017-03-16].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 [19] 杨建利, 邢骄阳.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4): 613-619.
- [20] 赵鲲. 共享土地经营权: 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实现形式[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8): 4-8.
- [21] 庄晋财, 陈聪, 成华. 农民创业者的村庄公共品供给行为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6(3): 11-18.
- [22] 庄晋财, 孙华平. 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实证研究[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1): 55-63.

(责任编辑:金会平)